

书海五十年

——记顾廷龙馆长

吴 织

顾廷龙先生字起潜,号匍匐,一九〇四年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翌年清政府下诏废止了科举制度,兴办学堂,而他仍从家塾里接受了启蒙教育,读了四书五经。父亲顾元昌先生是苏州的一位书法家,早年当过家庭教师,中年在苏州各中学里担任书法教员。由于父亲爱好书法,耳濡目染,使他在幼儿时就对习字发生了兴趣,小小年纪常握笔练字,为日后书法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岁时,进了公立学校,苏州草桥小学(原名吴县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正式开始了他的新式学生生活。

一九二四年,廷龙先生毕业于苏州的省立第二中学,为报考大学,准备了整整两年时间。翌年,考入了上海南洋大学机械系。一年后,因为神经衰弱,体质欠佳,遂转学到国民大学,从胡朴安、闻宥先生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后因学校改组,休学回到了家乡。在此期间,得到了伯舅王怀霖(字董成)和文学名家金天翮(字松岑)两先生的教导,学习古文诗词。

他的外叔祖王同愈先生(字胜之,一字栩缘,清光绪翰林,曾任湖北学政,江西提学使,是吴大澂的弟子,工书画,精鉴别)赏识他的才学与人品,聘他为家庭教师,教授他的小儿女及孙女辈。在王家任教期间,给了他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追随同愈先生左右,所见所闻全是学问,课余之暇,两人对古今中外的史事和朝章典故,以及目录版本,金石书画,无所不谈,既感到莫大的乐趣,而学业也随之进步。其间,在侍坐作画

中,曾萌起了学画的念头,而他的外叔祖也曾为他讲授绘画方法,诸如树石的阴阳向背,笔法结构,由简而繁,由浅而深。只是偶然发现同愈先生经常翻阅的抄本《四库简明目录》对他产生更大的吸引力,才转移了兴趣。这部目录上面密密麻麻写了许多批语,全是各书不同版本的批注,使他爱不释手,当即向外叔祖借了回去。原来这部书是同愈先生从叶菊裳(昌炽)处借抄的。当年朱学勤、邵懿辰、莫友芝三人同在北京,各就见闻批注在简明目录之上,然后三人交换传阅、相互补充。后来莫友芝之子绳孙编印为《邵亭知见传本目录》,邵懿辰的孙男章也编成《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唯独朱学勤没有写成专书。然而朱本所注尚可订补莫本,邵本之未备。这时,正当《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出版问世,相校之下,果然有不少出入。于是,廷龙先生以朱笔过录了朱校;又借得陆树声(号叔同,心源子)的批校本以绿笔过录了陆校。他以工整楷书密行细字并校于莫本的上下方。这件事情完成以后,连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毕生从事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校勘学的研究,就是这样开始了。

为完成大学学业,他又转学到上海持志大学,继续攻读文字训诂之学,一九三一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夏天,在顾颉刚先生的鼓励 and 帮助下,考进了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部。当时颉刚先生任燕大史学系教授,即住在他家。论族中行辈,颉刚先生晚一辈而年龄却长十一岁,由于他的祖与父都是颉刚先生的祖与父的学生,同族而又有

着师弟关系，因而两家往来密切，两人既是师生又是叔侄。早在一九二九年冬，在颉刚先生鼓励下开始编撰《吴恂斋先生年谱》并定为燕京学报专号之十。至一九三五年春始告完成，成为研究院学习成果之一。无疑这又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研究近代史和古文字的入门之路。

一九三一年顾颉刚先生在北大，燕大两校讲授《尚书学》，鉴于经学中之今古文问题以尚书为最复杂，而字体之讹舛又纷乱不可董理。为了解决此项难题，汇集五种古本：一汉熹平石经；二魏正始石经；三唐写卷子，虽作真书，尚留古体，即所谓“隶古定”者；四唐开成石经；五孟蜀石经残字及宋薛季宣《书古文训》本，合刻成编，尚书文字之纠纷问题乃有解决之希望。于是颉刚先生特邀先生合作，手摹授梓，成书逾半。不幸芦沟事变，北平沦陷，这项工作就停止了，以后一直没有机会继续，直到现在，才在党组织的关心下，安排了助手，重新整理。算来已隔了四十余年，而颉刚先生已经去世，不能参与其事了。

当年两先生从事《尚书》之学时，正值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有《尚书正义定本》之纂辑，廷龙先生得与吉川幸次郎、平冈武夫等日本学者相往还。研究之业相同，颇有交往之乐。他曾说过“隶古定”是文字变迁之一端，而非尚书本子专用之字体，吉川先生甚韪其言。廷龙先生欲疏释隶古之演变，因以“隶古定居”名其书室。

“七七”事变后，廷龙先生感于各公共藏书播迁无定，而私人藏书则流散四方，认为宋元本书影已有多种问世，而明清本尚无人编纂，就产生了编辑明代善本书影的念头，在他受聘于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为特约研究员时，就以编辑《明代版本图录》为研究课题。在借书很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约潘景郑先生合作，选辑了潘氏、涵芬楼、华氏、刘氏嘉业堂藏书中之明刻本。后来得到了开明书店经理王伯祥先生的支持，终于

编印出版，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这部书出版后，张元济先生赞道：“际此乱世，搜集材料，居然保全，且印刷亦殊不恶，是有天幸。”

一九三二年，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采访部一度无专人负责，当时，任该馆委员会主任是哈佛燕京学社主任兼历史系主任洪煊莲先生。廷龙先生和他是颉刚先生家中相识的，又以所汇录朱、陆批注的《四库简明目录》受到洪先生的赞赏，于是被推荐去担任采访部主任。当时馆中采访业务由采购委员会领导，委员有邓之诚、容庚、郭绍虞、顾颉刚诸教授，都是博综群书的知名之士，对书的选择自然也有各人的真知灼见，从而使廷龙先生的采购工作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但当时经费支绌，购书甚少，无力购买的也只能向其他馆借来传抄或用蓝图纸晒印以供读者。在这一段日子里，廷龙先生泛览群籍，知识面愈扩展，求知欲愈强烈，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此仅以能不离书本投吾所好，他无可恋，一书购到速送编目，不克细读，而俗务纷纭，不容其从容浏览，有如庖丁烹调盛宴，为主人享客，安得染指。”充分表达了他对新得的书爱不释手，虽想细读，但不得不服从工作为首要的遗憾心情。

一九三六年，廷龙先生兼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特约编辑，鉴于当时研究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玺印文均有专编，并有字典给予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唯独陶文一直不曾有同类编集出现，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以多年功夫搜集了从建德周暹（字季木）、吴县潘博山（字承厚）家藏的拓片，排次考释，又常和他们函牍往返，请教讨论，最后编辑出版了《古匋文彙录》，贯通了古文字的脉络，张政烺先生在《读古匋文彙录》一文中评价此书是“搜罗最备、考释最精，以专书形式问世第一部成功的陶文字典。”并称赞此书“摹写的准确，印刷的精工，绝非一般同类作品所可比拟。”杨钟羲先生（字芷晴、号雪桥）在《来室家乘》中记下第一次与廷龙先生见面的印象时说：“……起潜名

廷龙，与王胜之同年有连，中戊冬，胜之年八十矣，居南翔，为作书介绍来见，能读书，著《古蜀文¹卷录》，乞余书“蜀²谚”横额，有其乡郑盒、恣斋之风。”

一九三七年夏，校勘学家章钰（式之）先生病逝，家属章元美将其所遗藏书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保存，商定接收并举行了仪式。馆方以廷龙先生与章氏有旧交，章先生读了他撰写的《晋临雍碑跋》一文后，对学籍统计表证明“当时蜀吴尚未统一”，赞扬说：“为他人眼光所不到，老辈为金石学者，鲜能精密如此。”说他英年好学，而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遂将接收整理这批图书的工作交与了他。章氏藏书共计七万余卷，都经章氏读过，有的大部头书均经手校，尤为精审，正是章氏心力所萃。为了在藏书目录中反映出章氏的用功之处，又能突出重点，反映藏书者的宗旨，所以就不能同于普通目录的编排。采取了仿藏书志之例，凡章氏的题识、友朋的跋语全部备录，凡其师友均注明仕履著述，以详其渊源。全部藏书从接收之日至目录印刷装订完成，一部三十万字的目录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除有助手一人外，全部工作由先生一手完成。叶景葵先生见到后极为高兴地赞许说：“它是一部体例极善，足以表彰式老劬学之里面，可谓能不负所托矣。”可见先生的用心，有识者自能鉴之。更有意思的是这部目录成了日后叶景葵邀先生创办合众图书馆的“牵线人”。先生曾诙谐地说：“我是两部书目定终身。”就是指他一生从事图书馆事业是由两部目录作因缘的。先是放弃了学书画的愿望，用心汇录一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各家批注，而将他引进了燕大图书馆。后来是为反映章式老读书校阅的心力所萃。编成《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将他引进了合众图书馆。当然，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是他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和他不求虚名

只为务实的事业心，以及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才有可能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献身于图书馆事业。

一九三九年春，抗日战争的烽烟已经弥漫到素称藏书最丰富的江南一带，公立图书馆纷纷迁往内地，私家旧藏风流云散，有的善本被外国人乘动乱之机多方搜罗流向国外，目睹此情，有爱国心的学者，名流无不感到心痛如割。叶景葵先生发愿创办私立图书馆，想藉以保存亲朋所藏，不至流散。然而在如此艰难的时期，要白手起家筹建一个图书馆谈何容易！又有谁能胜任这个筹建事务呢？叶老先生出于对顾廷龙先生的了解和信任，多次恳切函邀他南归筹建图书馆。在信中这样写道：“弟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产十万（已足），另募十万（已足），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无建筑基金……。惟弟与菊生（张元济）均垂暮之年，愿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极赞许……。”出于保存整理祖国文化的共同愿望和感情，他毅然放弃了燕大对自己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接受了这几位热心图书馆事业的长者之邀请，带着妻儿回到上海。那时馆舍已租定，而真如叶先生所说：“空无一人，空无一物。”

“孤岛”时期的上海，环境困危，币值日跌，物价飞涨，度日维艰，先生抱着“不求近效，暗然日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宗旨，因陋就简，惨淡经营。根据图书馆董事会的意见，取“众擎易举”之义，化私为公，命馆名为“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先生首先捐献出自己收藏的全部书籍作为馆藏基础。其后，张菊生、陈叔通、陈陶遗、李拔可、蒋抑卮、叶恭绰、胡朴安、顾颉刚、潘景郑诸先生先后以多年所藏的图书、碑帖捐赠。同时也量力到旧书店甚至地摊上采购一些必需的书籍，在这方面廷龙先生尤其注重

于重要新书刊、文史资料以及前人稿本的搜集。他担任燕大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和后来主持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时的选书和采集资料工作，以及他所撰《介绍顾颉刚先生〈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一文，都体现了他访求图书的理论和实践。有时闻说某人家里的书刊要处理，就托人介绍前去从中搜检有用之书刊资料。后来上海图书馆作为稿本、善本收藏或影印、整理出版的，其中就有当时从即将处理的废纸堆中觅到的。例如：《强学报》第一期原来作为旧书的包裹纸，廷龙先生把它影印了，顾颉刚先生见了，欣然检赠他所藏的第二期也一并影印，可说是海内孤本。《布尔什维克》其中有一期调给有关单位配成全套，影印出版了。明万历刻本《三峡通志》、《严州府志》等，皆从废纸中抢救来的。又如沈曾植家的门簿，汪鸣銓家的收礼簿等请张元济、冒广生、顾颉刚、潘景郑等加了题记，成为有历史价值的材料，已发表在《文献》1986年第3期了，还有《票拟簿》三册是晚明（崇祯甲戌）温体仁为内阁时，代拟批示的底簿，在鞭炮作场检来的，但已失去一册了。先生认为从废纸中得来，是为人民增加了财富。

由于早年所读曹溶《流通古书约》的影响，他以极大的努力整理编印藏书和目录，由他经手编印和建议出版部门编印的书不下百余种，书目多种。在物力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亲自手写上石影印。凡“合众”藏书都有书本目录。廷龙先生又编印了《合众图书馆丛书》。

合众图书馆对于收集历史文献，不仅范围广泛而且有明确的目的性，为读者参考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而重要的资料。特别是一批革命文献资料，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去收集保存下来的。一九四七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疯狂逮捕进步学生，张元济、叶景葵、陈敬第（叔通）等十位爱国老人不忍坐视，联名写信给当局营救被捕学生，

信的原稿由廷龙先生保存下来，现在这份上海人民革命史的珍贵资料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孤岛”时期，图书馆地址虽在租界范围，但也有人多次欲来强占，遇到这种情况总须经过多方交涉疏通，乃得转危为安。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也常有敌伪军警和日本浪人到图书馆来骚扰，馆藏的抗日进步书刊，随时有被搜查的危险。廷龙先生依靠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支持，想尽了办法，使图书馆不致遭到破坏。此后，抗战胜利，又坚持到上海解放，就是这样含辛茹苦，惨淡经营了十一年。到建国初期，捐献人民政府时，馆藏已达到二十五万册。一些知名学者也常以此为探骊之所。读者中经常到馆阅书的有章鸿钊，秉志、林志垣、林志钧、刘垣、钱钟书、马叙伦、李平心、冯其庸等。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先生在他自传中曾写过这样的话：“我视大图书馆藏书为主要的精神粮库，长期在图书馆的苦学是生平精神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除了南京国学图书馆是我生平在学术文化上的最大恩人以外，他如……四十年代的合众图书馆，解放后的上海图书馆……都是我在这方面的恩人。”胡适为校《水经注》多次到合众图书馆借读《水经注》的各种校本，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和资料，这在胡适给友人的信件中都可以看到。

解放初期有位八旬老人刘垣（号厚生，武进人）刻意编写《张謇传记》，他以人物为中心，论述晚清五十余年政治演变的一段历史。这位老人记忆力颇强，腹中掌故极为丰富，但手头缺乏具体的史料，就向廷龙先生求助，从馆藏中为他收集了许许多多公开著作中不能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根据真实的史料，数易其稿，最后由龙门书局出版。刘老先生异常感激，特意在该书后记中说明：“张謇传记的材料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向图书馆搜集，而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特别热心，不嫌烦碎，我所指定的史料，顾先生能于十分钟内在杂乱的书城之中，取出供我阅读。顾先

生待我之热心，使我深为感谢，其胸中的渊博，尤不能不使我表示钦佩也。”刘先生致其姪欢曾信又说：“合众图书馆对于研究学术之贡献，极其伟大，尤其如顾君起潜之博闻强记，小叩小应，大叩大应，而且对于馆务，埋头工作，愿以此业终其身，环顾国内，罕见其俦。”华东师大历史系夏东元教授撰《郑观应传》也是得到了同样的帮助。当唐鸣时先生看到《郑观应传》后，也赞扬廷龙先生是位“博学强记，而且助人为乐……诚是做学问的良师益友也。”对待到图书馆来真正做学问、求知识的人，先生总是满腔热情、积极相助，无半点私心或垄断资料的特权思想，但对有的求名逐利的“学佞”，在治学上不择手段投机取巧之流，他却不愿以馆藏资料去投其所好。他以自己的博闻强记特长，真正做到了小叩小应，大叩大应，为专家学者乃至青年好学者，提供了难以计数的他处心积累而来的宝贵资料，其中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如上所述，廷龙先生自己，和他所期望于图书馆工作者，都能热情地为读者提供资料，答复咨询，成为阅览工作的特点。他主张在学术研究上，研究人员与图书馆员之间应该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

廷龙先生平日对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极为重视，这完全是由于他渊博的学识，深知其有用之处。比如他对清代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大量朱卷，并不因它一向被人们不屑一顾而随意弃之。他也并非看重朱卷中的八股文章，而是认为朱卷前面有考生的履历、社会关系、家庭渊源等，从中得到比较可靠的原始材料，所以史料价值很高，是传记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可编制清人传记资料。又如汪康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人）师友手札数十包赠送“合众”保存，其中有戊戌前后的重要史料，他不惮烦劳手加编次，并觅良工加以装裱，历时四年，订成六十巨册，现已由上海图书馆古籍组标点出版。又如：孙宝

瑄的《忘山庐日记》、杭州叶瀚的自传《块余生自记》等近人的通信集、日记、自传，都是近代史的第一手资料。明清史和目录学专家谢国桢教授在《江浙访书记》中，对他作了这样的评论：“顾君为人谨慎，熟于古文字及版本，亦精于目录之学，惟其有真知灼见，始能鉴别书籍内容之良劣，所以能披沙拣金、集腋成裘也。办理图书馆者不可无此人。今后向科学进军，尤其应当培养这样的人才。”这样的评价，先生是受之无愧的。他对前辈遗稿力谋保存整理，不辞辛劳的亲手缮写或请人传钞存馆，能出版者就设法印行。他曾说这是“聊尽后死之责”。先生宁可推迟自己著作出版的机会，也要设法将他认为应该出版的著作尽先整理出版。如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费树蔚的《韦斋集》、黄群的《敬乡楼诗集》、叶景葵的《叶景葵杂著》、张元济的《涉园序跋集录》、《书札》、《诗文》等都是先生亲自搜集编辑或由其醴金校印的。上海图书馆的俞尔康同志是位中年有才华又肯实干的人，不幸去世，他的遗稿，先生亦为之整理发表，也足以表达其爱才之心。由于先生的工作作风和为人，在学术界、图书馆界的影响很大，国内外慕名来访者颇多，而先生始终保持其谦虚、谨慎的学者风度。

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近代史方面还有许多“处女地”等待人们去开垦耕耘。图书馆工作者中如有人能象他一样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地对大量流散资料进行抢救收集，爬梳整理，辨其真伪，然后编目入藏，或整理出版，源源不断地为史学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这是多么重要和有意义的著作啊！

一九五二年，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合众图书馆董事会议决定将“合众”全部藏书二十五万册、金石拓片一万余种全部献给国家。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受，属市文化局领导，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任命廷龙先生为馆长。自此，图书馆的购书经费

年年增加，新书得到及时补充，新文化书刊与日俱增，为读者服务面也更加广泛。经历了新旧社会两种制度下图书馆事业的鲜明对比，使他更加坚定为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奋斗的信念与决心。

一九五八年，上海市的几个市级图书馆统一机构，（即将历史文献图书馆、报刊图书馆——鸿英图书馆、科技图书馆——明复图书馆等和上海图书馆机构统一）成为现在的上海图书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任命廷龙先生为馆长。

编制目录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部分。一个图书馆没有目录交给读者，就无法让人们利用它的馆藏。廷龙先生是目录学家，自然重视编目工作，他说过：“凡合众藏书都有书本目录。”当四馆统一机构正在拟议的时候，他却正在筹备编制前所未有的丛书目录。丛书是汇集若干种独立著作以成一书的刻印形式，图书馆编目往往没有细列子目，就使读者无法知其内容。廷龙先生在实际工作中领会到编制丛书目录的重要性，因而早在“合众”时代已悄悄地准备。他搜集了很多古籍丛书，编制了列有子目的卡片草目，等到四馆统一，馆藏丛书数量增至一千八百多种，以此为基础并联合国内各大图书馆的馆藏来编辑一部大型丛书目录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于是他带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进行编纂，从草创到定稿只用了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大型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综录》收录了国内四十一个图书馆的二千七百九十七种丛书，具备联合目录的性质。全书分总目、子目、索引三册，七百五十万字，问世以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图书馆界极大的重视和高度赞扬，认为《综录》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收录最广的古籍目录，在我国古籍目录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

六十年代的廷龙先生虽已年逾花甲，但精力充沛，每天必须处理大量繁忙的馆务工作，而他一天也未曾离开过书，人们很少在

馆长室见到，他的办公室就在善本组，他亲自指导同志们编制《上海图书馆善本目录》，校对原书，披阅目录，指导分类，鉴别版本，终日兢兢业业。他立志要将中国历史文化珍贵的遗产——古籍善本书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正当这部目录草稿将近完成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了“牛棚”，每天被迫从事与他年龄和体力不相适应的劳动，每个月只领取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为了订阅报刊，他不得不在有限的钱中再挤出书报费，因为他一天也不能离开书啊！

廷龙先生的夫人潘承圭女士，是一位贤淑文静的典型的中国妇女。他在合众图书馆参加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事务工作，处理有条。后改公立不久，因体弱多病，为了不愿久占编制，申请辞职。平生不事奢华，暇则手不离针黹编结。廷龙先生不问家务，专心一致地从事图书馆事业，真正得到了无内顾之忧，与潘夫人相助之力是分不开的。动乱中正卧病在床，目睹骚乱，病情越发恶化。沉重的精神打击，加上生活条件的恶劣，她终于承受不住，不无牵挂地离开了人间。廷龙先生经受了这一切不幸与接踵而来的精神打击。有一种力量使他在逆境中坚强生活下去，那就是出于对图书馆事业深深的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信念。

一切浩劫结束之后，廷龙先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对于消逝的光阴，他既不怨天尤人，更无长吁短叹，他以加倍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工作之中。一九七七年十月，刚恢复工作不久，国家文物局召开会议，他和上图党支部书记潘皓平同志一起前往参加，听了传达一九七五年十月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所作“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的重要指示。当时商定了收录版本及著作的时代，范围以清代为断，对于稿本、批校本及钞本等要广泛访求，郑重收录。全目分类仍照经、

史、子、集加上丛书。并指定上海图书馆为试点之一，以摸索编撰经验。一九八〇年五月，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廷龙先生任主编。全国七百八十二处藏书单位将各自选编的善本书目卡片集中北京，并组成了一支有各大图书馆参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专业人员队伍，进行卡片的汇编工作。古稀高龄的廷龙先生与同志们一起辛勤工作了八个多月。一九八一年十月，根据卡片目录改编成书本目录油印为《征求意见稿》，由各馆校核并征求专家意见。一九八三年八月为照顾他的健康，组织决定在上海进行定稿，他和两位副主编冀叔英、潘天桢同志同心协力，认真编校审定。一九八六年九月《经部》目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十月在上海举行了发行仪式。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撰文评介说：“这部目录是全国的古籍善本书目，包罗宏富，任何一部从前的书目都赶不上，这是近年中国图书事业的重大成就。……这样文化部似乎可以向周恩来总理做交代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化成就。……要讲精神文明的话，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精神文明最具体的表现。”（《人民日报》1986年10月15日）读到这样的评语，作为主编的廷龙先生感到无比欣慰和受到极大的鼓励，表示愿以“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累块不止，丘山从成”的精神自勉，继续努力将这部收书五万七千五百多种的全国公藏善本书目早日完成。

由于他的坚定信念和愿望，数十年对党、对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忠诚，一九八一年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近耄耋之年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廷龙先生将自己的一生与图书馆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鞠躬尽力，始终不懈，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他以一个有广博学识的版本目录学专家，书法家，不逐名利，不慕虚荣，切切实实做学问，全心全意献身图书馆事业，

成为学术界、图书馆界的楷模，受人尊敬的师表。近年来，他担任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特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兼任教授。他对生活从无奢求，常以“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自勉并教育中青年，而对国家和他人，他又是那样地热忱和慷慨，将家藏的顾嗣立《元诗选》癸集稿本、《明四皇甫（皇甫汈、皇甫冲、皇甫诗、皇甫濂）诗书卷》及清初顾祖禹（景范）、朱栢庐（用纯）、余澹心（怀）等题诗的马蕃侯象赞册捐献图书馆，将国家颁发的奖金又毫无保留地捐赠给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廷龙先生是上海市书法篆刻研究会委员，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参加访日书法代表团东渡日本，交流中日两国书法艺术。虽然他以有学者书风并以金文驰誉书法界，但是他始终不以书法家自居，他常说：“我不是书法家，写字是图书馆工作需要。”他对宋人程明道所说的：“非欲字好，即此是学”，非常欣赏赞同。他虽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自幼爱好钻研书法，又受名师悉心指导，然而自己对于书法的刻苦努力也同他治学一样一丝不苟，开始习欧阳询，后学赵孟頫，在行、楷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中年学六朝写经体，凡小篆、金文、甲骨文、陶文临摹之认真，无不倾注心血。写隶书先习张迁碑，后受老师刘三先生之影响，爱好石门颂。草书则习孙过庭的书谱。他将各种字体的变化，结构与古文字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如篆文基于金石之学，学篆字必须博古，既识器又辨古文字，加以他长期来多观拓本，这样多方面的努力造就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功力与眼力。如果说字为心画，书如其人的话，先生的书法与他的人品性格颇为神似，平稳、沉静、端庄敦朴而秀逸的学者风格。先生为人平易近人，素性淡泊、不善酬酢，然而求书请教者络绎于门。他从不苟且塞责，无论是给少

年写习字帖,还是为国外友人书写屏条对联,不论是寥寥数字的书名题签还是大幅的中堂,他都同样认真下笔,稍不满意即弃去重写,不轻易示人,直至自己认为比较满意后,才交给对方选用。从中亦可看到先生严谨的工作作风。

先生既有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优良品质,纯朴、正直,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忠诚地跟

共产党走。他还有一种独特的毅力。半个世纪来,无论是一帆风顺,风和日丽的美好时光,还是霜寒冰冻,风雨交加的阴暗日子,他始终是以静待动,以不惑的沉毅面对现实。他是一位博综经史,尤精校雠的目录版本学家,也是一个毕生忠诚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著 作 目 录

◁ 专 著 ▷

吴忞斋先生年谱

古匋文彙录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与潘景郑合编)

1935年燕京大学学报专号之十

1939年北平研究院手写石印

1941年开明书店影印

◁ 编 纂 ▷

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忞斋两家藏器目

章氏四当斋藏书目

合众图书馆丛书一集十四种、二集一种

补藤花馆石墨目录

汉书选(与煦华合编)

卷龠书跋(叶景葵撰)

涉园序跋集录(张元济撰)

中国丛书综录(主编)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

叶景葵杂著

1933年北平图书馆月刊7:2

1938年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

1940年—1948年合众图书馆石印

1942年武林叶氏石印

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9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9—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论 文 ▷

释克

释良

读宋槧五臣注文选

晋临雍碑跋

郁华阁金文跋

读宋槧苏轼诗顾注题跋记

服制备考跋

绥远方志鳞爪

薛允升服制备考稿本之发现

华夷图跋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教学研究周刊

4:42 1928:8

9:102 1929:10

燕京学报10期1931年

燕京学报14期1933年

北平图书馆馆刊7:1 1933:2

大公报图书副刊

禹贡2:7 1934:12

图书季刊2:2 1935:6

禹贡4:6 1935:12

Summary

Vice-premier Wan Li inspects construction site of National Library of Beijing

On Nov. 6, 1986 Vice-premier Wan Li inspects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the new building for National Library of Beijing. On the site seething with excitement the vice-premier gave in rapid succession five musts: the new building must be opened to public on National Day 1987, the construction work must finish on the 1st of July, necessary costs must be paid in full, supply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must be guaranteed, and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must be of first-rate in world, while the management must strive to reach a modernized level, to facilitate the usage by readers. This new building is a maj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and it signifies that China is a civilized country.

At the informal discussion at the site, the vice-premier, inspite of his seventy years of age, said in excitement: Premier Zhou Enlai entrusted to me this project, and it has beln delayed for twenty years now. It would not be justifiable if the project is not to be realized, and if it is realized, I'll have no grumble at the end of my days. His words brought his listeners back to twenty years ago when Premier Zhou in his sick bed made the decision to construct a new building fo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Beijing, and to seek a proper site once for good at Beijing's suburban area, while the old building was to remain as it was.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Beijing was asked to seek advice from Comrade Wan Li on the matter of site seeking and the height of the building. In his will, Premier Zhou entrusted to Comrade Wan Li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building for National Library of Beijing. Then in May 1980, when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discussing the "Outline Report of Work of National Library of Beijing", decision was made that: About the new building fo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Beijing, the project approved by the late Premier Zhou is to be enlisted in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s, and Comrade Wan Li is to take up this matter. Further in April 1985 when Comrade Wan Li was appraising the budget of the new building, he specified that "China should have a world first-rate library."

Occupying 7.42 hectares, it is now a building complex having a prominent trend of its time while still keeping its national features. The new building adopts profusely new appliances, new materials and new building technology, as such are needed by a project of such scale and such variety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It is also equipped with an advanced computer system, as well as fire prevention and anti-seismic structures. (P. 7)

Fifty years in the ocean of books

-On director Gu Tinglong of Shanghai Library

Mr. Gu Tinglong, besides being the director of Shanghai Library, holds other

prestigious posts such as vice-president of Council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member of Shanghai Committee of Calligraphy and Seal-engraving, etc. Being fond of learning even as a youth, he learned broadly and tried to memorize things, he is known to be always generous in giving a helping hand to anyone seeking knowledge and advice from him. Though a well-informed expert in bibliology, in bibliography and a calligrapher, he never seeks after wealth or fame, nor vanity. He devotes himself to learning and to library work and he becomes an exemplary person and respected teacher in the learned circle and in the library circle.

The author, the head of Old Books Department in Shanghai Library, based her account first-hand on her thirty years' work or learning together with Mr. Gu. The author thus has done well a meaningful job for readers of this Bulletin. (p.88)

Press Release MERGER OF IFLA'S UBC AND IM PROGRAMMES

From 1987, IFLA's core programmes for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MARC will be merged to form the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MARC Programme (UBCIMP). The Director will be Mr Peter Lewis,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British Library Bibliographic Services, and the Programme, which will be based in London, will draw upon the expertise of British Library staff, with Ms Julia Pratt continuing to act as Publications Officer. Advice will be provided by a new Advisory Committee which will be composed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groups within IFLA and from the Conference of Directors of National Libraries. Letter to this Bulletin attached below.

Chief Editor,

MERGER OF IFLA'S UBC AND IM PROGRAMMES

We enclose a PRESS RELEASE drafted by Mr Ross Bourne, Acting UBC Programme Officer, announcing the important merger of two of the core programme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From 1 January 1987 the two IFLA core programmes on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MARC will become the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MARC Programme (UBCIMP). The programme will be housed at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Please could you consider incorporating this PRESS RELEASE in the next issue of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We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could notify us if this PRESS RELEASE is used.

Thank you.

Yours faithfully,

Julia Pratt

UBC Publications Officer

Chinese text on backcover.